

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方法

尹飞霄^{1,2} 朱英明¹

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4) ²(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全球贸易研究, 义乌 322000)

〔摘要〕 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SYS-GMM),考察了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稳健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政府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企业负担,防止OFDI大规模外流。

〔关键词〕 宏观税负 对外直接投资 系统广义矩阵估计 环境规制强度 人力资本 营商环境 研发投入

DOI: 10.3969/j.issn.1004-910X.2017.08.019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1456.7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9.9%,流量首次位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不断地研究。资本外流的影响因素很多,有些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的丰富资源,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并获取高额利润;有些是为了寻求海外高效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还有些企业假借对外投资之名玩资产转移之实,把对外投资作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手段(牛晓健,姜波克,2005)。最近“死亡税率”引发的争论和福耀玻璃到美国投资的事件等引发了我们对宏观税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思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避税动机吗?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1 文献述评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1)国内影响因素。有研究显示国内GDP和出口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张为付,2008;于超等,2011)。有学者分析了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外汇储备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毛中根,唐振龙,2005)。温磊(2013)则从汇率视角分析汇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邱立成和王凤丽(2008)的研究发现,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关系。余官胜和袁东阳(2014)则从国内金融发展角度,分析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国内金融发展是否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张为付(2008)则研究政府的支持力度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东道国因素。良好的制度对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有积极的作用,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Dunning和Lundan,2008)。学者从东道国的民主政治发展(Kolstad和Wiig,2012)、法治水平(Mina,2009)、政治稳定(Noorbakhsh等,2001;Asiedu,2006)、腐败程度(Chueng,2011;谢孟军,2016)等维度,分析其对外直接

收稿日期:2017-04-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与调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ZDA053);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预研课题(项目编号:YY-SJ-201701)。

作者简介:尹飞霄,经济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全球贸易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创业研究。朱英明,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产品集聚。

投资的影响。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是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Aleksynska 和 Havrylychuk (2012) 实证分析表明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会增加, 而王永钦等 (2014) 和 Ramasamy 等 (2012) 的研究发现, OFDI 具有明显的资源获取动机; (3) 从母国和东道国双边因素来分析。殷华方和鲁明泓 (2011) 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间存在 S 形曲线关系。祁春凌和邹超 (2013) 实证发现制度距离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而蒋冠宏和蒋殿春 (2012)、周经和刘厚俊 (2015) 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宗芳宇等 (2012) 和李平等 (2014) 的研究结果表明, 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有助于企业走出去到签约国投资。

综上, 现有文献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都比较丰富, 但现有文献的研究逻辑多数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因某种动机而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 而鲜有文献分析母国某些因素导致资本被迫外流, 研究宏观税负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 并且现有实证分析不够严谨, 很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 且有些经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鉴此,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系统 GMM 模型分析宏观税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检验 OFDI 是否存在因规避国内税负等成本因素而外流的行为。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的文献中, 引力模型是比较普遍使用的模型之一。引力模型从母

$$\ln OFDI_{it} = \alpha + \eta \ln OFDI_{it-1} + \lambda \ln TAX_{it} + \theta CONTR_{it} + \beta_i + \xi_{it} \quad (2)$$

其中, $\ln OFDI_{it-1}$ 是被解释变量 $\ln OFDI_{it}$ 的一阶滞后项。调整系数 η 刻画了上一期 OFDI 的影响。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 (2) 来说, 由于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都是有偏的, 必须使用工具变量 (IV) 进行估计。而且, 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可能还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等。因此需要通过使用广义矩阵估计 (GMM) 方法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处理。广义矩阵估计有差分广义矩阵 (差分 GMM) 和系统广义矩阵估计 (系统 GMM), 而系统 GMM 兼具水平

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距离以及国家之间各种阻力因素和助力因素来解释国际投资流量问题。本文借助传统的引力模型原理,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修正, 并利用我国 2004~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设定如下模型:

$$\ln OFDI_{it} = \alpha + \lambda \ln TAX_{it} + \delta CONTR_{it} + \beta_i + \xi_{it} \quad (1)$$

其中, OFDI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TAX 为解释变量, 表示宏观税负, CONTR 表示与被解释变量有关的一组控制变量,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度, α 为常数项, λ 和 δ 表示系数矩阵, β_i 用于控制地区效应, ξ_{it} 为随机误差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模型 (1) 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 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式 (1) 右边的解释变量变动而即时变动, 对外直接投资与解释变量之间没有滞后效应。实际上任何经济变量本身都具有一定惯性, 即后一期变量结果会受前一期结果的影响。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有可能存在滞后效应的原因有: (1) 企业从项目资金压力和风险角度出发, 一般不会将投资额集中在一个年度内完成而可能会分散在不同年度; (2) 企业会根据以往年度投资的收益情况, 调整未来的投资计划和投资额度。另外, 解释变量宏观税负和某些控制变量也属于“惯性”较大的经济指标, 其调整是长期而缓慢的。因此, 需要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效应,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构建动态调整模型来控制这些因素。因此, 可以得到本文的动态研究模型:

GMM 和差分 GMM 的优点, 能够较好解决弱工具变量等问题。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用各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其 GDP 的比重来表征。我国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流量和存量两类数据, 考虑到动态背景下使用流量数据更具有经济意义 (肖文, 韩沈超, 2016), 本文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

2.2.2 解释变量

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核算存在小、中、大三种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实际入库的税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中口径宏观税负是全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由一般性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和社保基金等构成的全口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吴玉霞等,2016)。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特点,各种行政性收费的体量还比较大,若仅用小口径税负来衡量国内的税收负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而受省级全口径财政收入数据可得性约束。因此我们采用小口径宏观税负来表征,并用中口径宏观税负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我国现有的税收征收模式和税源特点,企业负担了大部分的国家税收。宏观税负越高,导致企业负担越重,引起资本外流。因此,我们预期宏观税负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3 控制变量

由于还存在其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为了获得更为可靠的估计结果,本文引入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效率工资(WAGE)。资本流动受到要素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生产者可以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进行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劳动力成本是企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使我国低成本优势正慢慢消失,各种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文建栋,林珊珊,2015)。但我们认为名义工资水平不能真实地反映劳动力成本,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我们采用效率工资,即职工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表征劳动力成本。效率工资越高,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越低,因此我们预期效率工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2)环境规制强度(REG)。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除环境标准外,其他条件都相同,污染企业就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6个方面来测度环境规制(张成等,2011)。考虑

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对完整性,本文参照张成等的研究选取各省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总投资额与工业产值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为缓解我国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加大了对环境执法的力度,提高了环境规制的强度。严格的环境标准,使企业面临两种选择:(1)引进先进的技术或加大研发投入来达标;(2)将企业转移到环境要求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但前者将导致生产者的短期成本增加。因此我们预期环境规制强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3)人力资本(HR)。无论经济发展还是企业经营运转,人力资本是关键因素,企业跨国经营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有多种,如区域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比等,但是这些指标均存在某些缺陷,例如受教育年限指标忽视不同层次教育的异质性特点,而高校在校学生并不直接的参与社会生产,不能很好的衡量人力资本。鉴于此,本文选取各省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来表征人力资本,该指标能较好地克服其他指标的不足。我们预期人力资本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4)营商环境(BUSINESS)。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发展(董志强等,2012)。营商环境是一个包括多因素,涉及范围广的复杂综合体(徐昱东等,20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市场因素、开放程度等6个方面度量营商环境,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则从国际一体化程度、金融服务、技能与技术等7方面来测度。学者樊纲则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等5个方面构建市场化指数来测度市场环境。有学者(张军等,2007;王晓娆等,2016)采用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数来度量腐败,但这仅仅衡量了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情况,无法考察未暴露的职务犯罪情况。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各省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征。公共安全部门人员是拥有自由裁量权,该比例越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安全部门人员越多,潜在腐败越高。由于2007年财政支出子项目进行过调整,为了统一口径,2004~2006年期间选取公

检法司预算支出和武装警察部队预算支出两子项目之和, 2007~2015年选取公共安全支出。我们预期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5) 研发投入(R&D)。本文用研发强度来考察研发投入情况, 选取各省R&D经费支出占GDP比值来表征。一般说来, 研发投入越大,

创新能力就越强, 区域创新能力越强, 企业的成本将越低。此外, 我国现有研发能力还比较薄弱, 国内企业因研发能力而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的现象比较少。因此, 我们预期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因此, 最终我们将本文的研究模型设定为:

$$\ln OFDI_{it} = \alpha + \eta \ln OFDI_{it-1} + \lambda \ln TAX_{it} + \theta_1 \ln WAGE_{it} + \theta_2 \ln REG_{it} + \theta_3 \ln HR_{it} + \theta_4 \ln BUSINESS_{it} + \theta_5 \ln R \& D_{it} + \beta_i + \xi_{it} \quad (3)$$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并且由于该公报从2003年开始才有各省OFDI流量的统计数据, 结合平衡面板的数据要求, 所以本文最后选取2004~2015年全国27个

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相关的分省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各年度的汇率取当年的平均值。各变量均为相对指标, 且为消除异方差, 本文对全部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lnOFDI	324	-6.205	-1.482	-11.513	1.370
lnTAX	324	-2.685	-1.643	-3.366	0.344
lnCZSR	324	-2.407	-1.516	-3.288	0.315
lnWAGE	324	0.462	1.441	-0.259	0.336
lnREG	324	-5.737	-3.556	-7.932	0.728
lnHR	324	-2.816	-2.227	-3.286	0.205
lnR&D	324	-2.440	-0.860	-3.486	0.523
lnBUSINESS	324	-4.403	-2.811	-5.966	0.578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有效避免面板数据估计中出现“伪回归”问题, 确保估计效果的有效性, 我们先进行了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结果显示整个面板数据服从平稳过程。为了更好地控制内生性和潜在反向因果关系, 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见表2。表2显示Sargan检验的P值均在0.1以上, 表明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均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即说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AR(2)检验结果则表明, 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采用逐步引

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解释变量在系数大小和符号方向上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说明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 4个模型中, 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前期的OFDI与当期的OFDI正相关, OFDI是一个连续、累积动态的调整过程。4个模型中, 宏观税负对OFD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在引入全部的控制变量后, 其回归系数为2.518, 且在5%水平显著。这表明宏观税负每增加1%, 会引起OFDI增加2.5个百分点, 在中国地区层面上验证了宏观税负导致资本外逃的结论。而效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3.895, 且在1%的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效率的提高能够减少OFDI,与我们预期一致。但是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0.78,即环境规制与OFDI负相关,与预期不一致。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本文选用各省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总投资额与工业产值比重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此指标越高,可能意味着污染治理投入越大,排污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企业可以进行更多污染排放;(2)这可能与OFDI的产业结构有关,OFDI以服务业为主,而工业占比较小。数据显示,2015年,

OFDI服务业占比超过60%。

此外,人力资本与我们预期一致,但它并不稳定,显著性水平较差。而营商环境的回归系数为1.107,且在5%水平显著,说明公共安全机构越庞大,腐败的可能性越高,营商环境就越差,从而容易引起国内资本外流。最后,研发强度越大,OFDI外流越低,这在一定程度说明,OFDI可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国内竞争比较激烈,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海外。

表2 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GMM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SYS1	模型2 SYS2	模型3 SYS3	模型4 SYS4
LlnOFDI	0.156* (0.082)	0.150* (0.082)	0.175** (0.085)	0.181** (0.086)
lnTAX	3.667*** (0.579)	2.167** (1.114)	2.582*** (1.133)	2.518** (1.155)
lnWAGE	-2.875*** (0.927)	-3.382*** (0.586)	-4.001*** (0.880)	-3.895*** (0.886)
lnREG	-0.640*** (0.195)	-0.600*** (0.197)	-0.745*** (0.194)	-0.780*** (0.199)
lnHR		0.818 (0.528)	0.797 (0.626)	1.101* (0.596)
lnBUSINESS			0.979* (0.521)	1.107** (0.530)
lnR&D				-0.440** (0.195)
CONS	1.907 (2.083)	0.311 (2.342)	3.766 (2.945)	2.550 (2.84)
Wald (chi2)	373.43	416.49	396.80	425.49
AR (1)	-6.40 [0.000]	-7.00 [0.000]	-6.52 [0.000]	-6.79 [0.000]
AR (2)	0.71 [0.480]	0.77 [0.438]	0.95 [0.343]	1.05 [0.292]
Sargan	7.72 [0.172]	5.34 [0.375]	7.74 [0.171]	7.98 [0.157]
观测值	324	324	324	324

说明:()内为标准误,[]内为p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4.2 稳健性检验

我们还选取了中口径宏观税负指标——财

政收入占GDP比值(lnCZSR)作为代理变量,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仍然采用逐步加

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上述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略。回归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OFDI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宏观税负提高会导致OFDI外流,效率工资、环境规制和研发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OFDI水平,而人力资本和营商环境水平的提高则会提高OFDI的水平。回归结果与前文模型高度一致,说明本文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方法都比较合理。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27个省2004~2015年的宏观税负和OFDI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SYS-GMM估计方法,有效控制和克服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以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宏观税负与OFDI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OFDI呈现出较强的动态特征,当期的OFDI受前期的OFDI影响较大,并且相对稳定。(2)宏观税负的增加会导致OFDI外流,即检验了“宏观税负增加,导致资本外逃”的假说。(3)工资水平与OFDI负相关,效率工资提高能够减少OFDI。换句话说,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增加将会导致资本外逃。(4)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导致资本外流的减少。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优化税制结构,严控偷税漏税,促进税收公平。具体而言,应全面降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现有税种税率,加快开征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新税种,这“一增一减”可以优化税制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使得经济总量增加,从而达到降低宏观税负的目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税收征管,严控“跑冒滴漏”和偷税漏税行为,并加大违法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全面清理各种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擅自延长优惠期限,提高返税比例,规范过渡避税行为,促进税收公平。

(2)适时降低社保费率,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收费,坚决取消不合理项目。目前我国社保费率过高,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成本压力,适时降低社保费率,帮助企业减负;大力推广“收费

清单”制,并向社会公开,使征收工作透明化,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坚决取缔各级地方政府违规设立的收费项目,并且防止国家明令取消、停征收费项目“死灰复燃”;对于保留的政府性收费项目进行规范,明确征收标准、征收对象、征收期限、收费去向等,坚决杜绝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强制违规收费。

(3)完善环境规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弱化以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机制,建立以环保绩效为重点的综合性考核体系。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针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中西部地区实施强制性的环境政策,防止高污染行业过度集中,同时,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对于环境压力小的东部地区则更多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鼓励政府和企业通过自愿减排而获得政策优惠;针对高污染行业如冶炼、火力发电等行业,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而对于清洁型行业制定较低的环境标准。针对跨区污染,要建立跨区的环境协调联动治理机制,坚决杜绝跨区污染“两不管”现象。

参 考 文 献

- [1] 牛晓健,姜波克.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研究[J].财经研究,2005,(10):14~21.
- [2]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130~140.
- [3] 温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7):104~108.
- [4] 于超,葛和平,曹家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学社论坛,2011,(6):109~114.
- [5] 毛中根,唐振龙.开放经济下资金供求非均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3):33~37.
- [6] 邱立成,王凤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6):78~81.
- [7] 余官胜,袁东阳.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8):125~134.
- [8] Dunning, J. H. & Lundan,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Ltd, 2008.
- [9] Kolsatad, I., and A.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76~87.
- [10] Mina, W., External Commitment Mechanisms, Institutions, and FDI in GCC count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Studies, 2009, 39: 337~350.
- [11] Noorbakhsh, F., A.Paloni, and A. Youssef, Human Capital and FDI In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 (9): 1593~1610.
- [12] Asiedu,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Market Size, Government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J]. World Economy, 2006, 29 (1): 63~77.
- [13] Cheung, Y.W., Jakob de Haan., Qian, X. W., Yu, S.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3): 201~213.
- [14] 谢孟军. 腐败、腐败距离与外资流入——基于中国 OFDI 的经验数据 [J]. 国际贸易探索, 2016, (5): 87~98.
- [15] Aleksynska, M., and O.Havrylychuk, FDI from the South: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29): 38~53.
- [16]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J]. 经济研究, 2014, (12): 126~142.
- [17] Ramasamy, B., Yeung, M. & 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 (1): 17~25.
- [18] 殷华方, 鲁明泓.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 S 曲线假说 [J]. 南方经济, 2011, (1): 26~38.
- [19] 祁春凌, 邹超.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J]. 当代财经, 2013, (7): 100~110.
- [20]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J]. 管理世界, 2012, (11): 45~56.
- [21] 周经, 刘厚俊. 制度距离、人力资源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J]. 财贸研究, 2015, (1): 73~76.
- [22] 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J]. 经济研究, 2012, (5): 71~82.
- [23] 李平, 孟寒, 黎艳.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 (12): 53~58.
- [24] 肖文, 韩沈超. 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 OFDI 的静态影响与动态效应——基于 2003~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 (11): 108~119.
- [25] 吴玉霞, 安娜, 杜兴涛. 中国省域宏观税负收敛性及演变路径 [J]. 经济经纬, 2016, (5): 138~143.
- [26] 文建栋, 林珊珊.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国际资本转移 [J]. 江汉论坛, 2015, (5): 15~21.
- [27] 张成, 陆暘, 郭路, 于同申.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J]. 经济研究, 2011, (2): 113~124.
- [28] 董志强, 魏下海, 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2, (4): 9~20.
- [29] 徐昱东, 崔日明, 包艳. 俄罗斯地区营商环境的哪些因素提升了 FDI 流入——基于系统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分析 [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5, (6): 57~66.
- [30] 张军, 高远, 付勇, 张弘.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J]. 经济研究, 2007, (3): 4~19.
- [31] 王晓娟, 王奎倩. 腐败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GMM 方法 [J]. 财经论丛, 2016, (8): 36~43.

Impact of Macro-level Tax Burden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Estimated by System GMM Method

Yin Feixiao^{1,2} Zhu Yingming¹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2.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of twenty seven provinces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level tax burden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 by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The result shows: the higher macro-level tax burden is, the higher the scale of OFDI is. Accordingly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lement structural tax cuts, clean up and standardize government fees catalogue, cancel unreasonable charges resolute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to prevent large-scale outflow of OFDI.

[Key words] macro-level tax burd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ys-GMM; REG; HR; business environment; R&D input

(责任编辑:史琳)